

曹维琼 吴达德 主编

史

学研究述评

XI BEN SHU SHI XUE YAN JIU SHU PING

谢本书

贵州人民出版社

谢本书



学研究述评

XIE BEN SHU SHI XUE YAN JIU SHU PING

曹维琼 吴达德 主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谢本书史学研究述评 / 曹维琼等编.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4

ISBN 7 - 221 - 07322 - 8

I. 谢... II. 曹... III. 谢本书 - 史学 - 学术思想 - 研究 IV. K092.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7938 号

责任编辑: 曹维琼

闵 英

封面设计: 张 彪

谢本书史学研究述评

曹维琼 吴达德 编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32 889mm × 1194mm

印 张: 9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21 - 07322 - 8/K · 936

定 价: 22.00 元

目 录

序	赵瑞芳(002)
谢本书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述评	吴达德(009)
谢本书历史人物研究述评	曹维琮(029)
谢本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述评	汤明珠(044)
谢本书军阀史研究述评	张神根(059)
谢本书爱国主义研究述评	龚喜春(068)
谢本书地方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述评	袁国友(080)
谢本书云南地方研究述评	牛鸿宾(093)
谢本书云南边疆民族研究述评	张 贇(106)
谢本书云南文化史研究述评	王国平(115)
谢本书历史教学方法研究述评	胡德斌(127)
谢本书——云南近代史研究领军人	吴宝璋(135)
附录一:我的二弟	谢本初(142)
附录二:父亲的路	谢嵩文(156)
附录三:谢本书史学论著目录	宋光淑(262)
后记	编 者(286)

序

谢本书是我在云南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的同学,同为调干生,他比我晚两年于1954年入学,是调干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由于大学期间我兼任学生党支部书记的工作,故在支部活动和其他社会工作中有过一些联系。他给我的印象是思维敏捷,办事快速,汇报情况时不仅简明扼要,还能把相关情况也作必要介绍,令人非常满意。由于他聪慧过人,勤奋好学,虽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可在跨入大学阶段后,却能取得优异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科研,在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成果累累。谢本书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治学经验时说,我遵循的是:严、钻、实,即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学问,实实在在工作。他长期以来形成的教学思想是:大学者,大师也;治学者,自学也;人才者,成果也。他说:一个大学,如果没有大师级的专家学者,就很难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治学是从自学开始的,作为一名教师,既要自己学好,更要教学生如何学好;人才是要通过成果来体现的,也通过成果来为社会作贡献,高质量的成果体现高水平的人才,也体现着人

的价值。

200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云南日报记者罗霞访问谢本书后,在报道中写道:谢本书一直践行着“尊重历史,勇于创新”的教学科研理念,他的人生旅程是“源于责任、成于创新”。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谢本书主编了我国解放后第一部史学概论教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在这部教材中,他把史学的功能概括为“四性”,即规律性、知识性、借鉴性和凝聚性。对爱国主义的特征,他也概括了“四性”,即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和层次性。这些认识颇为新颖,从而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红旗杂志》的评论文章称谢本书有“首创之功”。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黎澍由此借调谢本书到教育部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参加《史学概论》的编写工作。文革开始,谢本书回到云南大学。1972年,黎澍再次借调谢本书到北京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俄关系史》的编写工作,之后谢本书又被调到《历史研究》杂志社担任编辑。1975年谢本书再次返回云南大学。他的研究重心逐步集中在云南近现代史,特别是护国运动史、西南军阀史、历史人物研究上来。他认为,以反对袁世凯帝制为主要内容的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是又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对谁是护国运动的发起者?学术界众说纷纭,谢本书经过深入研究,得出了“联合发动”说。即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翼“欧事研究会”,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蔡锷、唐继尧为代表的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席卷全国人民群众反袁浪潮的基础上,联合发动了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并对护国运动的领导权、护国运动的特点、护国运动的历史地位等,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其论著有:《护国运动史》、《护国运动史的

几个问题》、《论护国战争》、《对“护国战争”几个问题的认识》、《护国战争与护国文化》、《护国战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联合》、《护国文献》等。

在西南军阀史的研究方面,谢本书的主要成果有:与冯祖贻共同主编100万字的三卷本《西南军阀史》,谢本书在这部著作的《前言》及有关论文中,对西南军阀史的分期、西南军阀的概念、特征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作了明确阐释,他说:西南军阀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1916年护国战争结束后,在北洋军阀势力尚未达到或未完全达到的省区,主要是云南、广西、四川、贵州、广东、湖南等,逐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方军阀,由于它们不属于北洋军阀系统,其所在省区又基本在西南地区,因而称为西南军阀(有时又称南方军阀),以区别于北洋军阀(有时又称北方军阀)。民国初年,西南军阀又分为两大派系,即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滇系控制了云南、贵州,并力图向四川发展;桂系控制了广西、广东,湖南也在其势力影响之下。谢本书还撰写了《关于西南军阀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论西南军阀》、《西南军阀形成的重要标志》、《西南军阀与五四运动》等论著。

随着研究的深入,谢本书又提出了“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政治概念,他说:“西南地方实力派”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未沦陷或未完全沦陷地区的实力派,他们有地盘、有实力,其势力范围主要在中国西南方的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广东、广西等6个省区,这与历史上“西南军阀”的势力范围相吻合。其论著主要有:《论地方实力派》、《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实力派》、《西南军阀与西南地方实力派》、《解放战争时期的云南地方实力派》、《云南地方实力派与“一二·一”运动》等。

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谢本书提出了“着眼于今天的高度、动机与效果、个人与群众”三点要求。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以阶级、时代、发展、功过为准绳。倡导建立“历史人物学”,作为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谢本书身体力行,前后撰写了10部人物传记:《蔡锷传》、《袁世凯与北洋军阀》、《唐继尧评传》、《龙云传》、《卢汉传》、《张冲传》、《民国元老李根源》、《战士学者艾思奇》、《世纪学人马曜评传》、《枫叶如丹——李群杰生平概述》,这些传记都已正式出版,即将出版的还有《蔡锷大传》,故有人称他民国时期为“历史人物传记作家”。在已出版的10部人物传中,以担任过民国时期云南省政府主要领导职务的蔡锷、唐继尧、龙云、卢汉传记的影响较大,有学者说:这四本人物传,就是一部云南民国史。

在云南近现代史和民族问题的研究方面,谢本书主编了《云南近代史》,对云南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特点、三次革命高潮等问题提出了符合历史实际的见解。对云南近代史的若干专题,如云南抗战史、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地下党、西南联大、“一二·一”运动、“七·一五”运动等问题都有专门研究,发表了《“五·四”运动在昆明及其对云南历史发展的影响》、《论滇军与抗日战争》、《龙云与云南抗战》、《抗战时期云南的发展机遇对现实的启示》、《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的统一战线工作》、《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有重要影响》、《朱德与云南陆军讲武堂》、《李根源与云南讲武堂》、《西南联大——多重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云南地方实力派与“一二·一”运动》、《昆明“七·一五”运动的历史特点》等一系列文章,并主编了《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云南不同类型民族地区分类指导研究》等著作,从而推进了云南近代史和民族问题的深入研究。

也许在别人眼里,谢本书是一个只会读书、写作,很少顾及家庭,更不会做家务事的人。其实不然,我们从他女儿谢嵩文写的《谢本书小传》中,可以看到一些感人至深的记述。

爸爸对我的关心照顾,不仅仅是在学习上,生活上也几乎是无微不至。上幼儿园时,爸爸常送我接我,有一次下雨路滑,爸爸就抱着我走,在下坡时不小心摔了一跤。那天我穿了一件新衣服,摔到地上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衣服弄脏了,于是我放声大哭,其实我并没有摔痛。爸爸哄了我许久,才把我送进幼儿园。后来我才知道,爸爸那天差点摔掉两颗牙。

上小学后,爸爸教育我,放学回家后,首先把作业做完再去玩,不然玩着也不痛快,因为心里会挂着作业还没做。我觉得爸爸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就养成了放学回家先做作业的习惯。有一次放学后,家里没有人,我没有钥匙进不了家,就在院子里趴在地上做作业,邻居阿姨看到了,直夸我乖,把我叫到他们家去做作业。

妈妈在云大图书馆工作,是按时上下班;爸爸除上课开会外,都在家里备课写文章。妈妈不在家时,煮饭洗衣服爸爸做,尽管他做的菜不太好吃,洗的衣不太干净。而爸爸却把这当作他读书写作中的一种休息,干得挺起劲的。有一次,爸爸看到我的裤子脚边缝线断了,便帮我缝好,后来我发现线与裤子布的颜色不相同,针脚也很大,才明白是爸爸做的,不禁涌出激动的热泪。

爸爸是慈善的,要求却是严格的。他常教育我,长大后,首先要做好人,同时要做好事。在爸爸妈妈的言传身

教下,我健康地成长起来,考上了理想的大学——北京大学。北大毕业后,又到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化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享受全额奖学金。2005年取得博士学位,随即应聘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科科莫分校担任助理教授。

我有一个愿望,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到国外去学习,我一定要让爸、妈也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我赴美国学习后,曾两次邀请他们到美国观光游览。第一次是我到美国学习的第一年(2001年5至8月),第二次是我博士生毕业,邀请爸妈、还有哥哥到美国参加隆重的博士生毕业典礼,并观光旅游(2005年6至9月)。

爸爸在美国游览期间,还挂念着云南的工作,他说9月开始的新学期,云南民族大学招收研究生较多、返聘他为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生指导教师。另外,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最近下达了一个课题,由爸爸负责,要求两年完成。

爸爸虽于1999年退休,时年63岁,但他退而不休,5年多来,他又出版了10多本著作,仅2001年就有5本:《走自己的路》、《救亡图存》、《捍卫共和》、《昆明史话》、《世纪学人马曜评传》。

谢本书几十年来孜孜不倦、不断追求,成果丰硕、道路坎坷。他性格直爽、爱憎分明,说话做事毫不含糊。他看问题尖锐,能开门见山、一语道破。这就难免会给自己惹来一些麻烦,曾经历过不少风霜雨雪,但也不断享受着丰收的喜悦。谢本书说:我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追求,它推动着我刻苦的钻,大胆的干,拼命的闯,自然也就带来了某些荣誉。然而,作为一名教师来说,重要的并不

在于头顶上的光环,而在于他的追求得到了某种满足和社会承认。

谢本书曾多次获奖,1989年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才”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谢本书出版了他的史论集,书名叫《走自己的路》。

谢本书的路是什么路?应该说是一条不怕困难、不畏艰辛、勇于攀登的路,无论身处顺境、逆境,他都坚持不懈、百折不挠地奋斗、拼搏。

通过为《谢本书史学研究述评》写序的过程,也是我进一步了解谢本书的过程,并从阅读该书稿件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由衷感谢谢本书同志对我的信任,给了我这个机会,同时也要感谢贵州人民出版社为社会又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作者为云南大学教授)

●吴达德

谢本书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述评

谢本书在长达近 50 年的学术活动中,著述宏富,先后出版了著作 50 余部(含合著和个人专著),发表论文数百篇,论著达千万字。这在全国学术界、史学界都是非常突出的。谢本书研究领域广阔,思想活跃,思维敏捷,时刻关注着学术发展的动态,始终活跃在学术研究的前沿。谢本书不仅以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闻名于学术界,在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出成就。本文仅就谢本书在史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研究略作评述。

一、初入史坛 涉足理论

谢本书步入史坛,可以说首先是从史学理论进入的。1959 年,谢本书大学毕业,留在母校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任教之初,他就主动承担了一门难度较大的新课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为此,他花费了一个学期的时间,编写了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的讲义,并登上讲台,讲授这门课程。这成为谢本书从事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研究的开端。不久,我国

著名历史学家黎澍看到了谢本书编写的这份讲义,认为“这个年轻人有本事,还没见第二个人做过这个工作”^①。此后,谢本书就不断得到黎澍的鼓励和帮助。1964年春天,黎澍将谢本书从云南大学借调到教育部文科教材编写办公室,参加到教育部正在统编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之一的《史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工作中。谢本书到北京后,按照黎澍的要求,首先系统地阅读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其中有关历史和史学方面的论述与著作。但是,不久“四清”运动开始了,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被迫暂停,谢本书又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教处,在此一呆就是一年。到了1965年底,谢本书返回到了云南大学。据谢本书回忆,在北京一年多的时间,对他“后来学术生涯有着深刻的影响,不仅扩大了视野,广交了史学界的朋友,而且也受到老一辈史学家(包括黎澍、翦伯赞等)的熏陶,特别是黎澍的谆谆教导,严格要求,以及其高屋建瓴、气势恢弘的研究方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黎澍的指引,对我后来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②。

20世纪70年代初,又因黎澍的推荐,以“外交任务”为理由,将谢本书借调到北京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参加“中俄关系史”问题的研究。谢本书在参加《沙俄侵华史》的部分研究编写工作后,又被借调到刚刚复刊的《历史研究》杂志社从事近现代史部分的编辑工作。后来,由于云南大学的不断要求,谢本书放弃了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学校,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两次北京之行,时间合计达5、6年之久,这对于谢本书拜访名家,开阔眼界,从事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特别是黎澍先生的关怀和帮助,对谢本书后来的影响更大。正因为如此,谢本书一直把黎澍视为学术成长中的“恩师”。

20世纪80年代初期,谢本书参与主编教育部委托山东大学历史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合作编写的高等院校历史专业基础理论课教材《历史科学概论》一书,这是1949年后的第一本史学理论教

材。这本教材出版至今已再版了5版,获得了社会的好评。现在许多大学历史系都采用为教材。

所有这些,为后来谢本书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增加了他对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兴趣。可以说,谢本书初入史坛,是从史学理论起步的。

二、史学理论研究

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谢本书主要就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生产方式,即社会形态理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历史认识等理论问题参与史学界的讨论,并不断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对上述问题的看法与观点,在史学界产生了影响。

五种生产方式,也即五种社会形态,一般来说是指人类社会依次经历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社会形态理论是历史学能否上升到科学形态的一个关键,又同中国社会的改造密切相关。从20世纪20年代起,该问题就在中国学术界展开过讨论,以后又不断反复地进行。1949年以后,我国史学界主要是围绕中国历史分期这一学术问题而涉及到这一理论的。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深入,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和热烈。

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社会形态理论问题的热烈讨论中,谢本书著文支持和赞同“五形态说”。谢本书的基本观点是:“五种生产方式说应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义”;“人类社会历史大体上是沿着五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演进的”。谢本书认为:“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由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唯物史观的原理首先提出一些初步构思,经过列宁、斯大林的进一步明确表述而最终形成”。“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学术上,都曾产生

巨大的力量。五种生产方式说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列宁、斯大林最后完成,这个理论应该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本义的”^③。但同时,谢本书又进一步指出:“至于在实际运用这一理论过程中,图式化、模式化、教条化,我们是反对的,但这不是理论本身的错误。当然,我们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发展,属于马克思主义本义范畴的东西就不允许讨论,相反,科学不是封闭的、僵化的东西,它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自己。退一步说,随着科学的发展,材料的增多,研究的拓展,将来有一天确实有新的正确理论取代了五种生产方式说,这并不是坏事。即使如此,五种生产方式说作为一种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史上的功绩也是不容抹煞的”^④。谢本书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是符合理论发展规律,是事实求是的。

关于社会生产方式、即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当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有持“五形态说”、“六形态说”的;有持“四形态说”、“三形态说”的。对此问题,今天也仍有更深入探讨的必要。谢本书支持和赞同“五形态说”,但我们也注意到他反对在实际研究中僵化地、教条地对待“五形态说”,承认“五形态说”“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这种态度,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关于历史的规律性与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问题。谢本书指出:“历史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历史的必然性,是不应该有所怀疑的”^⑤。表达了一个学者鲜明的态度。他针对20世纪80年代我国哲学界和史学界有学者重新强调历史发展既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⑥,又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⑦。指出:“既承认客观规律的自然历程,又承认人的能动作用,如何把这两方面加以统一?或者说统一于什么基础之上?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难题所在”^⑧。谢本书认为:“历史的自然过程与人的能动作用,是相反相成的,它们不是统一于‘人和历史环

境’，而应该统一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本身不是主观随意性的，而是具有客观的性质。自然历史过程具有规律性、必然性，这是不言自明的，而强调历史过程人的能动作用（主体的活动），也不意味着否定或者抹煞历史规律本身”^⑨。谢本书还明确指出：“把规律图式化，作为一种教条，不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入手，是不妥当的，然而如果因此而否定历史规律本身，则更难认为是妥当的”^⑩。

在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问题上，谢本书说：“当我们在阐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同时，承认历史的发展是丰富多彩的，具有多样性的特点”^⑪。谢本书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多样性，可以归纳为：超越规律的多样性；在同一个社会形态内部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突发性偶然事件使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增加了新的内容。他在阐释“超越规律的多样性”时指出：“如果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五种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的话，那么在某些国家、地区和民族，则不完全是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有的可能超越一定的生产方式，有的则可能倒退回已经经历过的一定的生产方式，有的则可能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之下长期停滞不前”^⑫。他在阐释“同一个社会形态内部历史发展的多样性”时指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至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往往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出现气象万千，各不相同的个性、特征和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⑬。他在阐释“突发性偶然事件使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增加了新的内容”时指出：“历史偶然性的例子俯拾即是”。“有的偶然性是必然性的直接表现形式，或是它的补充；有的则比较间接，甚至看起来几乎全是一种巧合，一种纯粹的偶然。然而，历史的发展决不能否定偶然性的作用”^⑭。谢本书鲜明地表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乃是规律性与多样性统一的结果”。

关于历史认识,1987年创刊的《史学理论》杂志,在其《时代?历史?理论》的代发刊词中指出,战后几十年来,国外的历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西方的史学理论思想,同哲学思想一样,已经并正在经由研究客体向主体的转变,注意对认识论问题的研究”。然而所有这些我们都所知不多,缺乏研究^⑤。我国史学界对作为独立体系的史学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而对主体、主体认识、主体意识等课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才引起注意。然而什么是历史认识及历史认识论,它在史学理论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认识主体、主体意识的含义是什么,都还不甚明了。1987年,谢本书就著文《论历史认识》,参加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

谢本书首先指出历史认识与历史认识论是并不完全相同的两个概念。“历史认识,是指历史研究的主体(人)通过一定的方法,研究一定的史料,以达到认识历史客体的过程”。“至于历史认识论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知道认识论是把认识本身当作思考和研究的对象,是对认识本身进行认识,也即对认识进行反思”。“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不是历史世界中某种事物、某种现象的发生及其规律,而是研究历史认识的认识发生过程及其规律。历史认识是研究历史的认识及其理论,历史认识论则是研究历史认识的认识及其理论,这就是二者的联系及其区别”^⑥。谢本书在其文章中,进一步分析阐述了二者在认识主体上的一致性以及二者在认识客体上的不一致性及其思维方式侧重点的不一致。谢本书在其文章中,还着重阐述了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主体认识及其特点,指出:“第一,历史的认识不能离开‘感性认识——理性认识——感性认识’的基本原则;第二,历史认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回顾性;第三,历史认识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超前反映的特征”^⑦。

其后,谢本书又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从认识论的角度讲,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一方面是相对的,另一方面是逐步的。